

新 哲 学

第七辑

 大象出版社

新 技 工 ！

新 哲 学

第 七 辑

主 编

王中江



📖 大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哲学. 第7辑/王中江主编. —郑州:大象出版社,
2007.9

ISBN 978-7-5347-4771-7

I. 新... II. 王... III. 哲学—文集 IV. B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99493 号

出版人 李亚娜

策划人 耿相新

责任编辑 吴韶明

责任校对 钟 骄

封面设计 秘金通

出版发行 大象出版社 (郑州市经七路 25 号 邮政编码 450002)

网 址 www.daxiang.cn

制 版 郑州普瑞印刷制版服务有限公司

印 刷 河南第二新华印刷厂

版 次 2007 年 9 月第 1 版 200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 张 19

字 数 393 千字

定 价 30.50 元

若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印厂地址 郑州市商城路 231 号

邮政编码 450000

电话 (0371)66202901

学术编辑委员会

学术顾问

任继愈 李学勤 叶秀山 庞 朴 汤一介 余敦康 李亦园
耿云志 杜维明 陈鼓应 韦政通 罗多弼 黄俊杰 王树人

学术委员(按姓氏笔画)

万俊人 王 路 王晓朝 王葆珰 刘小枫 刘岳兵 刘笑敢
许纪霖 孙 歌 汪 晖 李存山 李明辉 何怀宏 吴国盛
陈 来 陈少明 杨国荣 张汝伦 张祥龙 张斌峰 张曙光
郑大华 庞元正 赵敦华 胡 军 姜广辉 郭齐勇 钱永祥
倪梁康 徐友渔 高力克 高瑞泉 葛兆光 童世骏 景海峰
韩庆祥 韩 震 彭国翔 慈继伟 黎红蕾

主 编 王中江

本辑作者

沃特·B. 古立克(Walter B. Gulick) 美国蒙大拿州立大学
费尔·慕林斯(Phil Mullins) 美国西密苏里州立大学
R. T. 艾伦(R. T. Allen) 英国“后批判人格主义研究学会”
郁振华 华东师范大学
安·J. 卡希尔(Ann J. Cahill) 美国埃伦大学
珍妮弗·汉森(Jennifer Hansen) 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
肖 巍 清华大学哲学系
章梅芳 清华大学
刘 兵 清华大学
钱永生 湖南大学
斋木哲郎 日本鸣门教育大学
荒木见悟 日本九州大学
林文孝 日本山口大学人文学部
木下铁矢 日本综合地球环境学研究所
陈怀宇 美国西来大学
王 路 清华大学
殷海光 台湾大学

目 录

“默会认识论”

信号、图式、辅助项和技能:对非言述者的言说

..... 沃特·B. 古立克 (Walter B. Gulick) (1)

理解及“综合体”:波兰尼的默会认识论及其形而上学意蕴

..... 费尔·慕林斯 (Phil Mullins) (19)

波兰尼与默会整合 R. T. 艾伦 (R. T. Allen) (39)

默会认识:一种维特根斯坦式的研究进路 郁振华 (56)

“女性主义”

大陆女性主义

..... 安·J. 卡希尔 (Ann J. Cahill) 珍妮弗·汉森 (Jennifer Hansen) (74)

女性主义认识论图景 肖 巍 (94)

女性主义方法论特征及其在科学元勘中的体现 章梅芳 刘 兵 (111)

中国哲学:研究与反思

墨子思想核心之争议的回顾与反思 钱永生 (138)

董仲舒与《春秋穀梁传》

——西汉穀梁学的一个断面 斋木哲郎 (157)

中国佛教基本性格的演变

——中国佛教与亲鸾 荒木见悟 (170)

欧阳修的正统论与历史叙述 林文孝 (183)

朱熹的思索、其面貌与可能性	木下铁矢(202)
文献主义与民族主义:近代佛学视野中的陈寅恪	陈怀宇(216)
金岳霖的逻辑观	王 路(238)

哲人佚文知见录:殷福生(海光)英文佚文及中译(下)

A Scheme of Research Concerning Neotraditionalism in Modern China

.....	Yin Fu-sheng(260)
-------	-------------------

May Fourth Man

—a heuristic analysis	Yin Fu-sheng(268)
-----------------------------	-------------------

近代以来中国新传统主义研究框架	殷福生(278)
-----------------------	----------

“五四人”

—— 一个探索性分析	殷福生(286)
------------------	----------

编后卮言	(295)
------------	-------

信号、图式、辅助项和技能：对非言述者的言说

□ 沃特·B. 古立克 (Walter B. Gulick)

要说清本文的主旨很容易，它可表述为：人类认识的默会维度是所有学习和成就的基础。其过程和能力应当包含在任何一个充分的哲学体系中。虽然这个过程对教育和成就是如此关键，但在学术著作中对默会认识的关注还相当有限，对于默会认识是如何起作用的，很少有一致的看法。心理学文献中有些零星的讨论，涉及了知识中的各种非意识因素，但就我所知，在心理学中尚未出现连贯的、成体系的关于默会认识的理论。关于默会认识的最一贯的理论是由科学家—哲学家迈克尔·波兰尼 (Michael Polanyi) 提出来的，“默会认识”这个术语就是他创造的。本文将聚焦于波兰尼的那些富有挑战性的重要贡献。不过，我发现，波兰尼对默会认识的讨论并不总是完全一致的，有些界定得还不够清晰。因此，我从其他思想家那里吸收了一些在我看来能够深化、澄清波兰尼的洞见的思想。这篇文章同时也依赖我个人的经验和反思，因而说到底应当看作是我试图阐明默会认识、展现其在哲学中的地位的一种尚在展开中的微薄努力。

什么是默会认识？波兰尼没有给出一个固定的答案，而是更多地通过例子阐释这个术语的意义。下文将仿效这个程序。但是，波兰尼对默会认识的结构_的讨论是一致的。他从区分辅助意识和焦点意识开始。波兰尼主张，所有焦点意识都依赖于对辅助项的默会整合以产生一个焦点整体。他的分析源自格式塔心理学，却大大扩展了其心理学起源的范围和意蕴。

为了使我们的讨论有一个明确的起点，我们先考察一下波兰尼的巨著《个人知识》“火炬丛书”版的著名前言中的两个段落：

当我们依赖于对某物 (A) 的意识来关注另一物 (B) 时，

我们只是以辅助的方式意识到 A。因而我们所聚焦的 B 就是 A 的意义。焦点对象 B 总是可以确认的,而 A 这样的我们辅助地意识到的事物,可能是无法确认的。这两类意识是相互排斥的:当我们把注意力转移到原本一直是以辅助的方式意识到的事物上时,它就丧失了先前的意义。简单地说,这就是默会认识的结构。

现在我们来谈谈默会知识和明确知识的区别。我们具有焦点意识的东西是可以明确地确认的,完全明确(wholly explicit)的知识是没有的。首先,使用中的语言的意义,在于其默会的成分;其次,语言的使用包含了我们身体的行动,而对后者我们只有辅助意识。因此,默会认识比明确认识更为根本:我们所知道的多于我们所能言传的,而不依赖关于我们也许不能言传的东西的意识,我们不能言传任何东西。(1964, x)

我认为,焦点—辅助关系的发现,是认识论分析的一个重大突破。为了更全面地描绘波兰尼的完整的洞见,上面的引文应该作如下补充:“辅助项与焦点的关系是由某人的行动造成的,他把前者整合进了后者。”(1975, 38)一旦人们拥有了将注意力从某些事物出发转向其整合意义的一些个人性的实例,就会发现,这是我们在世界中思考和行动的普遍模式。我们的思想和行动以各种身体技能(bodily skills)为基础,它们很容易被忽视,而一旦被忽视,就会产生错误的理解和学习的形式。

如上引第一段所示,默会认识的结构已经表述得很清楚了,虽然必须注意到,通常波兰尼在 A 的位置上谈论的是多重线索,它们被整合起来构成 B。波兰尼指出,我们可能对辅助项有所觉察(aware),但通常对它们无明觉的意识(conscious)。不太清楚的是,焦点是否必须是明觉意识的对象。在上述引文中,焦点对象(两次)被认为总是可以确认的。但是,波兰尼在别处指出,我们也许并不意识到焦点对象,比如,当我们努力解决一个科学问题的时候,“我们能够把注意力集中在细节的联合意义上,即使我们关注的焦点没有具体的中心。这意味着我们把握问题的能力。问题揭示了在指向某种未知事物的一群线索中存在着鸿沟”(1969, 171)。

波兰尼多次提到如下心理学实验:在电击之前,让被试者听同样没有意义的音节。被试者开始期待电击,但又说不出是什么让他有此期待。波兰尼说:“这个实验在两个事件之间建立起一种固定的联系,这两个事件我们都知道(know),但是只能说出(tell)其中的一个。”(1969, 142; 还可参见 1966, 7-12)他认为,对即将到来的电击的期待,有一个格式塔式的特征,因而证实了默会认识。音节和电击之间以实验的方式建立起来的联系,不是被明确地认识的,而是被内隐地认识的。这种联系应当被描述为波兰尼所描述的那样的一个事件吗?在这个实验里,整合的本质到底是什么?

过去几十年间的心理学研究表明,波兰尼探讨的非意识联系根植于长期记忆的一个方面,Daniel Schacter 称之为“知觉表象系统”(perceptual representation system,简称 PRS)。这个系统“专门处理词语和对象的形式和结构,但是对于词语的意义或对象用途,它却完全不‘知道’。有意义的联系和概念是由与 PRS 密切合作的语义记忆所操控”(Schacter,1996,184)。在许多事先准备(priming)的例子中,都有 PRS 的位置,其中某些起初没有记住的知觉影响了后来完全有意识的选择。Schacter 说无意识的抄袭可能包含着事先准备(167)。而事先准备则是隐藏着的内隐记忆世界的一个特征。“不隶属于任何背景或上下文的思想涌现出来,我们认为自己把它们想出来的,尽管它们源自某个特殊的经验”(189)。内隐记忆的非意识行动,与弗洛伊德假定为无意识过程本质的压抑无关。内隐记忆最好被看作非意识过程之一,支持更为宽泛意义上的默会认识的观点。Joseph LeDoux 给出了反对非意识加工的相关性的两个一般性主张,然后提出了许多反论证,本文采取的立场与其一致(参见 1998,脚注 47,311-312)。

对波兰尼上面两段文字的进一步分析,引发了更多的问题。在第一段里,波兰尼说 B(焦点)是 A 的意义,而在第二段中,他写道:“使用中的语言的意义,在于其默会的成分。”这让我觉得很费解:语言被适当地运用时,其意义应该是明确的。这只是我对波兰尼的“默会”究竟意味着什么感到困惑的例子之一。“默会”在词典里的基本意思是“不诉诸语言而被理解”,显然这也是波兰尼通常所指的意思。默会者即非言述者。那么,为什么他说使用中的语言的意义(言述的)是默会的(非言述的)呢?意义是无形的——这就是他想要说明的吗?

我引用波兰尼的文章,针对他的意图提出问题,有双重目的。首先,讨论默会认识时,从一个主要的源头开始并熟悉它的词汇是很重要的。其次,我也想指出,虽然波兰尼的总的视角是相当富有洞见的,但它不是没有问题的。术语的使用必须清晰、一致。而且,波兰尼之后出现了一些新的洞见。作为一个哲学家,我将利用来自心理学、语言学、人类学、生物学或者无论什么地方有用的洞见,来展开我的讨论。

这里简单地谈一下我对默会认识的看法。积极地说,它是技能性成就的身体化技艺。它促进学习。讲一讲默会认识不是什么,也是有益的:它不是处于人类意识前沿的、我们的认识之依靠符号的、言述的方面。默会认识是人和动物共有的认识形式。人类是否具有纯粹由基因提供的本能知识,这一点是很有争议的。确实,大多数在默会的、非言述层面上的知识是学习得来的:基因为我们提供了性向和天资,它们必须通过实践和经验而加以发展。

波兰尼企图把默会认识限制在意识状态(conscious state)中(1975,41)。为了实现这个限制,把默会认识(tacit knowing)和默会过程(tacit processes)如 PRS 区分开来是很重要的,后者可以是默会认识的意识维度的完全无意识的作用因素。整

合的行动通常不是有意识的行动,比如把眼睛提供的视野整合为三维图像。波兰尼认为,整合行动是最典型的默会能力(1969,140),但是整合行动包括在执行某种意向性行动时肌肉细节的协调——它们几乎不能说是有意意识关注的主题。因此,默会过程可以理解为相当于非意识的(non-conscious)或无意识的(unconscious)过程。无意识有时候被实体化,被作为一种实体或者一个领域来对待(如弗洛伊德所为),但这是根本无法成立的,我们不能以这样的方式对待默会的东西。默会认识被认为总是有一个意识的维度,但是默会过程则不必是有意识的。

为什么了解默会认识如此重要?第一,所有认识都有一个默会维度,所以,要想理解认识之所以可能,理解促成知识内容之建构的基本过程是至关重要的。第二,人们一旦意识到默会认识在任何知识建构中所作出的重要贡献,就不会被客观主义误导。长期以来,客观主义困扰着西方哲学,为知识制定了错误的、无法企及的标准。第三,客观主义失败后,不能为人类生存提供有益的洞见和引导的客观主义哲学也衰落了。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将默会过程视为主观的、不可靠的东西加以拒斥,在一种虚幻的客观性的基础上提出了各种删节了的认识论。第四,一旦语言的使用依赖于默会的、非言语的技能这一点变得清晰起来,认为知识完全包裹在语言中的各派哲学就会受到质疑。后期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罗蒂、德里达等后现代主义者的哲学,以及——按照某些解读——库恩的哲学,成了某种形式的相对主义的牺牲品,更糟糕的是,它们终结于某种不可公度的生活形式。一旦语言被认为是无法逃避的,默会的东西的实在性被遗忘,这类哲学观点所引入世界的不连贯性就会随之而来。第五,一旦我们对默会过程作出了清晰的阐述,就不必涉及可疑的被实体化了的无意识领域。弗洛伊德以最著名的方式提出了这个实体化了的无意识领域,它对心理学内外的众多理论思辨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显然,存在着许多影响着人类的思想和行为的非意识过程,一个被审慎地提出的关于默会过程和默会认识的理论,能够有效地阐明无意识的动力学。

二

让我们通过比较在四种不同的情景中如何达到认识的例子(每个例子都受到了波兰尼著作的启发),来探讨默会认识的多样性。我们将在考察这些例子的过程中,确定并讨论默会认识所包含的关键因素。

1. 我在人群中遇见一个陌生人,突然认出了她的面容。
2. 我花了不少时间,尝试用各种方法解一道微积分难题。后来,躺在床上时候,答案突然出现在我的脑海里。
3. 我学习骑自行车。
4. 我用一根探棒,了解到了从一个黑暗的洞穴分叉出去的一个空间的四壁。

1. 第一次在人群中与一个未被认出来的人碰面,我模糊地觉得她有点儿熟悉。在认出她之前,我得一遍又一遍地注意她的面部特征。她的面容是一个格式塔(gestalt),这使得我能认出她来。我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

由于恐怖主义的威胁,人们的安全意识越来越高,对于理解认人过程的兴趣随之增加。Joseph Atick 正在研究面容识别技术,设法想象人脑实际上是如何处理脸部形象的。“这有点像数据处理问题,如何处理几百万个细微的信息碎片。但是他发现……应该往反方向寻找解决方法。即尽可能少地使用信息……(他的系统)在脸部选取几十个点,用这些点来创造一张脸的图像。”(O' Harrow, 2005, 161)另一种识别技术,即指纹识别,不是依赖于记录皮肤的纹理,而是检测图案的异常之处。这里存在着人类如何利用默会特征识别事物的线索吗?

为了识别一张脸,我们会观察某些关键特征——可能是颧骨的位置、下巴的类型、嘴唇的厚薄、眼睛的大小、脑袋的长短等,并把它们整合为一个整体的图案,来和我们记忆中的图案作比较。被整合的特殊细节不是作为分离的对象为我们所观察,而是作为辅助项为我们所寓居(Polanyi, 1969, 182)。只要这些特征以一种整合的方式与其联合意义相关联,我们就能意识到它们,这张脸就是它们的联合意义,它是我们有意识关注的焦点。结果是,我们的意识有一个 from-to 的结构。我们的意识从辅助特征转向了一个已被认出的整体,即她的脸。这里的整合不同于把清晰地描述出来的细节作线性相加。它是一个难以具体说明的、默会的行动。“可具体说明性(specifiability)的不完全性有两种情况。一、总有一些细节剩余物是没有被具体说明的。二、即使细节能够被确认,孤立多少会改变它们的外观”(1969, 124)。如果在可通达的格式塔的库藏中,没有什么特定的格式塔能够用来确认她的面容,就应该尝试关注其他的细节:我们会考察她的发色、衣着、体形、举止等以发现某些显著特征或异常之处,它们会为确认她的身份提供线索。

通常,认出一个人的同时,差不多就会意识到其名字,但有时并不一定。作为一个执教多年的教授,我得承认,通常我能认出一个我认识的人来(通常是学生),但却一时想不起他的名字。这个例子证实了我们的直觉,即识别过程是一种默会技能,其中语言没有重要的位置。

理解默会认识的一个关键概念是图式(schema)。人类和动物都依靠图式来指挥行动、知觉和观念。刚才已经提到,为了识别一张脸,我得把观察到的格式塔与我已知的类似的格式塔相比较。这些记忆中的格式塔就是图式的范例。康德使用了图式这个观念,此后,人们以不同的方式使用这个术语,这些用法之间具有松散的联系。Ann Brown 说:“图式这个术语的使用广泛而模糊,而且并不总是富有意义的。”(1979, 231)所以,尽可能清晰地阐述我用这个术语的含义,并说明何以我认为图式对于理解默会过程是如此重要,是我的责任(进一步的讨论参见 Gullick, 1992-93, 17-20)。

康德把图式观念作为规则引入,根据这个规则,人们将形成一个想象的观念(比如,我的家),去适应和解说一个概念或者词语(“房子”)。“只有通过其所归属的图式,意象才能与概念相联系。”(康德,1933 [1787],A142,B181)康德的范畴必须先图式化,然而才能应用于经验材料。因此,我们的想象力利用图式,把概念的抽象性与它们所指涉的经验世界的(真实的或想象的)实例联系起来。“房子”一词就像一个一般的格式塔,有很多不同的真实或想象的房子实例归属其下。康德把图式限制为从概念到知觉的规则,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不能反其道而行之,即从经验实例走向其所归属的一般概念。事实上,我发现图式概念对于解释大量的学习过程非常有用,这些学习过程需要语言和意象、肌肉和动作或者意识和经验实在之间的交流。

Frederick Bartlett 关于想象力的颇具影响的著作,是探讨图式概念的很好的出发点。他的著名主张是:记忆与其说是恢复贮存的信息,不如说是信息的重构。人们起初是通过架构性的图式和具体内容的结合来记住故事的,但是时光流逝,人们会遗忘具体细节,在创造记忆的过程中,图式就会起更大的作用。听同一个故事,不同的人会依据他们各自所内化的并将故事归属其下的人生哲理,来回忆故事内容。因此,时间过去越久,他们对故事的重述就越是经过了他们的经验和偏见的诠释,越发偏离了原初的内容。

对 Bartlett 而言,图式是无意识的,与长期记忆以及知觉、想象力、建构性思想(13)都有关联。我将扩展其对图式的理解,提出所有学得的经验(与特殊记忆)都可以编码到图式中。按照这样一种看法,图式作为所有长期记忆系统的组织成分而存在,人们依赖于图式,把已经学得的东西应用到新的(甚至是记忆中的)情景中去。Schacter 区分了四种主要的长期记忆系统:片段的、语义的、知觉表象和程序的(1996,特别参见第六章)。片段记忆使我们能够从过去唤回具体细节;程序记忆“使我们获得各种技能”(292);语义记忆包括“构成我们关于世界的一般知识的概念、联想以及事实的一般网络”(169)。所以,长期记忆的图式既与 Bartlett 所指出的知觉、想象和思想相牵连,也与感觉到的联系(通过 PRS)和技能相牵连。如果真是如此,那么从事各种教育工作的人,必须非常认真地对待图式。

我认为,图式在头脑里的作用类似于地图或者代码,使人们根据先前的经验,对可能要发生什么事情产生期待。它们也提供新经验必须被同化在其中的框架。因此,在这种图式观和皮亚杰的同化与适应理论之间有某种联系,不过,最能引起我共鸣的还是波兰尼对非言述的学习的理解。在“非言述的智能”一节里,波兰尼提出了动物的三种默会认识方式,这三种学习方式也是人所拥有的。

第一种称为“窍门学习”(trick-learning)。这种方式基于动物的运动性,起于动物走动过程中偶然发现的有用行动。在一些经典的动物心理学实验里,可以看到笼子里的老鼠东嗅嗅、西抓抓,偶然碰到了释放食物的杠杆,老鼠就会更主动地

考察这个吃到东西的地方,很快就学会碰杠杆释放食物。“我们可以说老鼠学会了创造出一种对它有用的效果,或者说它发现了一种有用的手段—目的关系”(1964,74)。为了觅食充饥,老鼠内化了一个图式——一个程序记忆的模式。

第二种波兰尼称之为“记号学习”(sign-learning),但是为了与把所有意义单位(包括符号[symbol])当作记号的一般倾向相一致,我将用一个更为特定的术语“信号”(signal)来代替波兰尼所使用的“记号”(sign)。在信号学习的实验中,一个动物“通过确认预示事件的信号,学会期待一个事件的到来”。动物受欲望或者恐惧的驱使而学习,因此,预示着性愉悦(发情期母狗的气味)或者危险(掠夺者的气息)的环境信号,是被感知的、被图式化的有意义模式的很好的例子。这类学习是感知表象记忆的例证。

默会认识的第三种类型叫“潜在学习”(latent-learning)。如果满足欲望(或者逃离危险等)的正常途径被阻塞,为了解决问题,动物会建构一幅关于某一情景的心灵地图,这时就会发生潜在学习。它获得了被编码在语义记忆中的那种基本的理解形式。波兰尼把上述三种非言述方式中的启发式学习行为,与日常的、可逆的活动相对照,后者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学习、活动发生在一个作为理解之基础的现存知识框架之内。现存框架是那已学得的行为的图式。如果基于一个足够恒常的基础,就可以反复地用它来解决问题。

可见,图式是一般的模式——本质上是格式塔式的——这使得许多特定的表现都落在它们的范围之内。Mark Johnson认为,这些模式“主要是在我们的跨越空间的身体运动、我们对对象的操控以及我们的知觉交互作用的层面上,作为有意义的结构向我们呈现的”(1987,29)。Robert Howard对图式的使用更为宽泛。他说,它们“被用于知觉、理解、学习、记忆和解决问题”(1987,176)。因为我们已经看到,图式例示了这么多类型的长期记忆系统,并且在这么多类型的非言述的学习方式中得到发展,所以,Howard关于图式适用于广阔领域的主张是能够成立的。

我已经强调过图式的重要性,可是在人类经验中,它们至多也不过是作为影子一样的东西来展现自身。人们可能认为,它们不过是方便的解释性工具,或者是掩饰广大的无知领域的有用的黑箱。事实上,我认为,我们能以多种方式通达图式,它们会使我们对它们的现实性增强信心。心理学家在用实验方法对图式进行研究时陷入了困境,因为每个人都有一套独特的描述已经学得的东西的图式。对于这种牵涉如此多变量的复杂多样的现象,要设计以经验为基础的研究项目,是件困难的事。在心理学研究中,研究大脑不同部位受损伤的人,是十分重要的。但是,个体也能通过研究他们自己的感情来通达图式(详见下文)。通过观察人们如何根据背景信息来组织他们的经验,还可以间接地观察图式。Roy D' Andrade提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出现了一个支持图式的研究,人工智能研究者试图开发能够诠释和理解小说的计算机程序。为计算机提供所用词语的定义和语法规则,还不足

以使计算机解释、了解小说。计算机还必须理解小说预设的、使得故事连贯的背景关系和格式塔——背景的文化图式(1995,125)。所以,个人也许不能直接以言述的方式通达其个人图式,但是通过考察他所认同的行为模式和文化模式,间接地通达还是做得到的。

考察图式的一个方式,就是把它看作康德式的图式化的范畴,但不再为纯粹理性的理想所制约,而是囊括了某人在架构其经验的过程中学到、用到的所有东西。这是将哲学经验化,摆脱其理性主义的腔调,将哲学置于历史和经验的具体世界之中。Lakoff 和 Johnson 的一些著作,代表了这种用经验的方式从事哲学研究的成就,他们强调第二代认知科学的研究成果。他们从众多研究领域寻找证据,加强了对三个观念(认知的无意识、心灵的身体化以及隐喻的思想)的信心,这三种观念与我们对图式和默会认识的讨论密切相关。他们有力地论证了,在思想和行动的形成过程中,认知隐喻(我认为它具有图式化的存在)起了重要的无意识作用。为认知隐喻的作用提供趋同性证据的实验技术,包括“事先准备、解决问题、推理论证、形象分析、分类、文书分析和话语理解”(1999,83)。

形象图式是特别重要的认知隐喻。形象图式以普通对象和人类经验的身体化行动为基础:容器、力量、方法和目标、环节等等(参看 Lakoff,1987,271-278)。它们先于、独立于任何概念来架构经验。在下面一段中,Lakoff 和 Johnson 讨论了形象图式如何形成空间经验(一种康德式的原始的直观形式):“我们把空间经验视为由形象图式所架构的那样(即拥有边界区域、通道、中心和边缘,有前后的对象,事物之有上下和旁侧),尽管我们现在知道,空间本身没有这样的结构。”(1999,508)

我认为,图式的抽象的模式化关系与大脑的神经网络是相对应的。毕竟,图式描绘了独特的习得的关系,正如大脑所形成的独特网络,既基于经验又影响着经验。因此,提起图式,我们就会提到个体学习者对复杂世界的理解方式。图式不仅是环境的恒常性之抽象表象,而且也是“加工机制;它们积极地选择证据、分析由我们的环境所提供的数据、提供合适的一般的或者特殊的假说。大多数(如果不是所有的)激活过程都是自动发生的,无须感知—理解者的意识”(Mandler,1984,55-56,引自 D' Andrade,1995,122)。就是说,默会认识(信号学习和窍门学习)的学习过程包含着各种图式,它们为默会认识(潜在学习)提供内容,影响、巩固着明确认识。它们是个人的真理的储藏室。

下面是图式如何作为个人真诚性的守护者起作用的一个例证。当我表达对我个人来说很重要的东西(而不单单描述某物)时,我常常觉得难以找到合适的语词。在这些场合,我的语言不是主要的;我努力使我的话能够与我的还只是被模糊地理解了的意思相吻合。那个意思在很大程度上是图式化了的。如何从图式化的情感转向公开展示或实践,是下面两个例子的主题。

2. 某道微积分题很难,用我以前的办法解答不了它。所以,我暂时把它放一放,尽管在我准备睡觉时,这个困惑依然存在。我躺下来,再来思考怎么解答这个题目时,答案不期而至。

答案并不受我的控制。它不像在演绎推理中那样,是由一步一步的逻辑步骤得出的结论。它是一件礼物,近乎天赐,尽管人们为这种洞见的出现创造了条件。因此,默会认识对于答案的产生和确认起了很大的作用,尽管答案是用明确术语表述的。

那么,人们是怎样得到答案的呢?再一次,波兰尼对于我们理解最终导致发现的默会认识的动力学是有帮助的。他认为,发现的过程是一种启发式的成就,既需要主动的阶段也需要被动的阶段(1964,125)。我们必须要有解决问题的理智欲望,然后,我们的“启发式的努力就会功德圆满”(126)。波兰尼这里提到了默会认识中的一个关键步骤——唤起。

我们注意到,当面部的各个特征被整合起来形成一个已知的面貌时,我们就识别了作为一个格式塔的一张脸。这种整合是一种非线性的综合。但是,整体也能够被分析为不同的部分,而这是唤起的结果。综合与分析、结合与区分、整体与部分,就像整合与唤起一样,这些术语昭示了默会认识的动力机制。如果一个格式塔式的图式代表了某种通过学习而获得的某种认识,那么我们可以说,它是将各个起作用的洞见结合到一起而产生的,通过某种整合而最后发出“aha”这样的感叹。试想人们要寻找的是会解决问题的某种未知的格式塔。我们怎么知道该将哪些成分整合到一起来发现答案呢?

唤起这些成分的一个方法是,将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一些我们不是很清楚的事情上。波兰尼引用了 Polya 的一本论述解决数学问题的著作:“‘注意未知的东西’——Polya 说——注意结果。记住你的目标。不要忽视了要求是什么。记住什么是你正在寻找的东西。‘注意未知的东西,注意结论’。”(1964,127,引自 Polya, 1945,112)存在着一些可能的有助于解决问题的因素,对之人们可以相当自信;人们试图唤起的是一些缺失的成分,它们对于产生一个连贯的整体以解决问题而言是必需的。这类似于在纵横填字游戏里找字一样,人们并不知道答案,尽管有很多线索:人们知道要找的单词有多少个字母,给定的定义或语言线索,已知单词在直角处为人们正在寻找的单词提供的字母,如此等等。“这个关注未知的告诫的真正含义是,我们应该考虑已知条件,但不是关注它们自身,而是作为未知的东西的线索,作为未知的东西的指示者和它的一部分”(Polanyi,1964,127-128)。我们寓居在辅助项中。严格地说,被唤起的是缺少的成分,但是一旦我们找到了正确的成分,并将其作为被寓居的辅助项加以安置,它们就支持一种整合;通过由解决问题而来的满意的感觉,这种整合被认为是一个答案。当事物最终连贯地配合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体验到了解脱、和谐和成功的感受。这类情感是在默会认识与明确

认识上都取得成就的标志。

另一个找出答案的方法,一开始与波兰尼所提倡的方法类似,但它不是那么以目标为中心,也不是那么令人紧张。一开始,通过关注问题和考虑那些与答案似乎相关的观念或形象,来使心灵做好准备。然后,转向其他事情。有时,过了许多小时以后,答案突然就出现了。更平常的是,当人们再回到问题的时候就心智清明,能够看清各种联系,在寻找答案上有所推进。在这些情况下,看来是语义记忆联合知觉表象系统,在默会与内隐的层面上起作用,产生了一些重要的联系。

另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是最容易说明的——如果要解决的问题与自我知识有关——尽管这种方法也有更为广泛的用途。这种方法背后的想法是:通过关注人的情感,可以直接地——尽管是缄默地——通达图式。我认为,对于提升我们对情感的敏感性最有帮助的作者是 Eugene Gendlin,尽管必须马上指出,Gendlin 并没有谈及图式问题。他提供了一种他称之为“聚焦”的技术,他主要的兴趣是治疗性的而不是说明性的。

Gendlin 首先观察到,当那些陷于个人问题的病人和治疗师——他会告诉他们一些更专注地倾听他们自身的内部状态的方法——积极配合的时候,在解决在他们生活中造成痛苦与压力的问题上,他们会有所进步。责备自己和他人,反复思考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以及其他各种本质上以语言为基础的做法,都无助于病人正确地对待机能障碍的内部来源(这个观点在 Timothy Wilson 那里得到了确证——参见 2002, 167-176)。Gendlin 提供了与一种特定的内在身体意识建立联系的步骤,他把这种意识称为一种被感受到了的感觉(a felt sense)。这种感觉是相当模糊的总体状态,而不是一种显著的情感。“这就是你的身体是如何负载着整个问题的”(1981, 69)。它必须被接受,必须被轻柔地询问。更具体的感觉是从这种总体感觉中产生的。当某人经历了某种身体上的释放之后,他知道,他听到了一种真正有意识的声音从不是默会的东西中升起。被感受到了的感觉改变了。当他把一直是默会地恼人的东西表达出来的时候,他会感到非常释然和自由。Gendlin 相信,他的聚焦观念把人引向了一种先于身心分离的内在状态(165)。图式构成身体技能和有意识的思想的基础,它们具有一种前意识的身心关系,Gendlin 把它归于由被感受到了的感觉所展现出来的东西。神经学家 Antonio Damasio 为 Gendlin 所描述的这一类现象提供了最新的生理学解释。他认为,内脏、附于骨骼的肌肉和心灵,都有助于背景情感的形成,后者“有助于界定我们的精神状态,使我们的生活色彩斑斓”(1999, 286)。Damasio 指出,“背景情感与冲动和动机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286),而 Gendlin 的技术试图阐明的正是这种图式化了的默会材料。在许多日常的活动场合中,这种被感受到了的背景材料,构成了默会认识的“from 维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波兰尼认为,在科学发现中的创造性与艺术中的创造性并没有种类差别。在